

在上海书展重新“发现”谢晋

——《永不谢幕——百年谢晋百人谈》出版



本报 他是一面旗帜，也是一部传奇……2023年是谢晋导演诞辰100周年。2024年夏季，根据近100名文艺界、学术界人士口述实录汇编而成的新书《永不谢幕——百年谢晋百人谈》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日前举办的2024上海书展首发。

从影60多年，执导数十部电影作品，谢晋导演一生热爱的电影事业，见证了时代进步。早期他执导了《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影片。改革开放后，他的艺术创作巅峰到来了。在这一时期，谢晋作品带有强烈的济世情怀，高度关注国家发展和人物命运。1979年起，《啊！摇篮》《天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批具有反思精神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电影应运而生。

2008年10月，谢晋导演因病逝世，享年85岁。2018年，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永不谢幕——百年谢晋百人谈》由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汇编。“谢晋导演为电影而生，也在电影中永生。”上影集团副总裁、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徐春萍表示，谢晋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旗帜性人物，这本新书的出版是对谢晋电影艺术的一次全方位回忆，也是中国电影人对谢晋导演的再一次集体致敬。

该书汇集了韩美林、吕其明、祝希娟、王馥荔、姜文、濮存昕等文艺界人士的最新口述实录，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影视摄制幕后细节，并配有100多张电影剧照、海报以及谢晋个人照片等。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回忆

道：“在片场，你若见到他那伟岸的身影，你会觉得他就是电影世界的主宰。他的气度非凡、‘气场’强烈，一切都说明他就是属于电影事业的那个人。回赠他的作品，你会发现所有项目里，他都为中国电影后辈做了最好的示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独有的‘士的精神’，看到他基于中国伦理道德的思辨和对中国式审美的高度自觉，今天我们依然能从中不断汲取营养。”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1月，日本著名表演艺术家栗原小卷率团到访上海时，也应邀专门赴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录制了口述实录。《永不谢幕——百年谢晋百人谈》一书中也收录了栗原小卷关于与谢晋导演合作拍摄《清凉寺钟声》的一些细节。

栗原小卷回忆道：“我感觉在不同的时期看他的电影，始终贯彻描绘有爱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和感动。”她还在上海录制口述实录期间，写下感言：“我真的很想再当面说一声‘谢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温泽远感慨，谢晋导演的影视作品承载着无数观众和读者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他本人也成为中国电影在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

“以‘永不谢幕’为主题的这本书，生动描绘、再现了谢晋导演艺术生涯中的点点滴滴。他生前有句名言‘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也希望这本书与谢晋导演的影视作品一样，可以赢得好口碑，在老百姓心目中‘永不谢幕’。”他说。

(许晓青)

读《纪录片的诗学想象：历史与文本研究》有感

——一个中国学者的厚度、宽度与深度

——体大虑周，十年一剑

文刘广宇 张译丹

研究纪录片，既往的路向或角度大抵有三种：一是纪录片史论的路向；二是文化、意识形态研究的路向；三是创作论即“纪录片制作法”的路向。这三种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但这三类成果虽有其专攻一端之深刻，却也都不免有单向度之感。

近读四川大学侯洪教授的《纪录片的诗学想象：历史与文本研究》(以下简称《诗学想象》)，惊喜地看到，此竟已得到极有力度、厚度的填充。这部巨著从历史学视野观照纪录片但志不在史论，深挖纪录片的社会文化、艺术美学价值而亦非单纯的文化研究，荟萃诸多典型创作案例予以剖析却不止于探求创作法则，而是以媒介考古学为主要方法，且辅以多种相关理论，以纪录片发展史、节点为经，以各阶段纪录片范型文本为纬，对纪录片的本体特质即话语特征与功能特性，以及演化发展轨迹进行了独到而精辟的分析、描述，并结合新近的技术发展，为纪录片“能成为什么”做了前瞻式探索。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10章洋洋洒洒135万余字，以纪录片通史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将纪录片理论与纪录片实践打通，创新建构纪录片研究框架之际立即重返创作实例进行实证，将艺术纪录片作为媒介物质，从内容的艺术性、形式的艺术性以及艺术性功能三方面结合，系统地艺术纪录片研究新创了一个研究范式。

与剧情片蔚为大观的研究、批评相比，纪录片长期处于被漠视和误解的境地，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纪录片研究才开始崛起，西方影视学界甚至因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纪录片不断发生类型新变的现实而形成了批评和研究“突然爆炸”的局面。但是，今日的纪录片创作虽因制播技术的发展和创作观念的拓新走出了宽广的大道，纪录片研究、批评也已然成喧嚷的显学，然而纪录片创作界、学界仍在为纪录片本体特质的定位定性即“纪录片是什么”而大存困惑乃至激争如“战场”，而其争论的焦点始终是关于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

这一重大问题的争论可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纪录片的特质是内容客观、手法纪实，一派则认为内容不可能不主观、手法不能自困于“直接电影”的纪实方式。《诗学想象》也深度介入了这一“战场”之中，不赞同“客观”派的主张，以“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观念谈论真实问题：“历史的真实性之‘真’其实就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身的真实”。

但侯洪若只是以某个或某些新说的理论或观念来立论，那这部专著也并不能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和应予重视的是他不眼限于已见的论者缠斗，而是诚恳地脚踏实地回到纪录片创作史、回到纪录片本身去讨论问题，寻找答案，由对经典性的里程碑样本即纪录片发展各阶段具有范型意义的纪录片类型的归纳和精细分析来给出独树一帜的本体论见解。

精彩的是，著者观照纪录片史实时，采用了不同于大流的角度和眼光，顿时就让这些众皆熟知且反复论述过的样本/类型焕发/被发掘出了新意——例如其探究纪录片的叙事与事实之间关系的“上编”，就大笔如椽地将纪录片囊括为人类学纪录片、艺术纪录片、主流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四大类型，以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将既有的旧材料翻出了新异的材质，并由此“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纪录片从内容/主题到修辞/话语都必然有其“诗学想象”属性。

人类学纪录片与艺术纪录片是“再现”与“表现”的两个极端，前者因人类学学科的宗旨而特别强调如实记录的客观性，但侯洪教授通过另眼观照该类型的发展历程、深入分析该类型典例的特征，证明了该类型必需的学理性和科学发现功能，使其兼具绝非纯客观的“发现与使命”。后者更是毋庸置疑、无可讳言地充满了

开拓新媒介时代电影研究的新思维与新格局

——评《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争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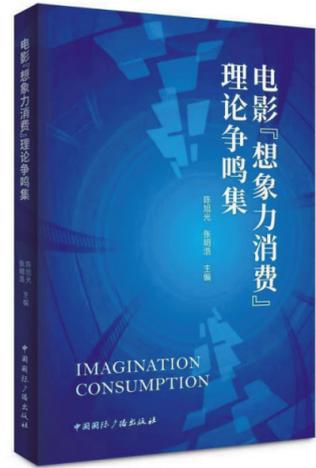
文/宋子晴

21世纪进入互联网新媒介时代后，青少年成为艺术作品的受众主体，他们对虚拟、架空、超现实的喜爱，使得文化消费中对需要更多想象力发挥的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急速增加。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提出“想象力消费”这一理论命题，立足中国影视行业现实，对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创作现象、新模式和新文化进行探析和理论总结，重新探寻影像与现实、影像与人主体之本体论的关系，推动电影观念和电影理论的新变。

“想象力消费”理论自提出至今，学界已有150余篇相关文章，探讨与争鸣如应斯响，源源不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今年3月付梓出版，陈旭光、张明浩主编的《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争鸣集》精选了自提出至今约20余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在编排上遵循著述的体例和逻辑，划分了“理论前史：缘起与历程”“理论的本体建构”“理论的跨学科建构”“理论的争鸣探讨”和“理论的批评化实践”五个板块。精选本具有一定体系性，通过系统梳理“想象力消费”理论从缘起到争鸣、发展的整个历程，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该理论的阶段性成果及意义，促进理论的研讨与深化。

关于“想象力消费”理论为何生成、从何而来的问题，陈旭光在该书第一辑中，从当代影视艺术与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向谈起，提出在如今平民化、大众化、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一种颠覆以往艺术所恪守的“真实性”原则的“后假定性”美学正在崛起。而后，陈旭光又结合中国电影的现实境遇，呼吁中国电影让超越的更超越、经验的更经验，走类型化道路，并在《关于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问题的思考》一文中为中国“幻想电影”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之道。第一辑最后，陈旭光从电影工业美学的角度，分析了《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人》这两部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构思、价值定位、生产运作及结果，认为这两部电影共同引领着“想象力消费”时代的来临。综上，陈旭光通过该书第一辑的四篇代表性文章，阐释了“想象力消费”理论的缘起，同时也初步展现出该理论“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自觉。

该书第二辑以“理论的本体建构”为主旨，首先对“想象力消费”进行定义，分别阐述了艺术理论、文学理论以及电影中“想象力”的含义，并进一步探讨了电影想象力的实质，总结出互联网时代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四种模式。同时，通过论述“想象力消费”理论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关系，明确了该理论承接中国“地气”、贯通中国传统且开放包容、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学科交叉性与融合的特点及理论建构原则。阐明以上问题后，第二辑的后三篇文章，则深入论述了“想象力消费”的现实依据、美学特质、实现路径等多个层面，并论证出“想象力消费”具有艺术审美



功能、文化经济功能、青少年“重新部落化”与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凸显出“想象力消费”在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与融合方面的功能性和目的性。

针对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具有学科交叉性的特点，该书第三辑《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文化批评的延伸和转向》一文便探讨了“想象力消费”理论在文化批评方面的双重转向，一重是心理学的拓展和消费经济学的跨界，另一重是文化经济学转向，昭示了“想象力消费”理论不仅在电影创作和批评中发挥其优势，未来也能在社会心理、媒介融合、大众文化等领域，开辟出独特坚实的话语阵地。秉承经世致用的务实原则，本辑还针对不同作品类型，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建构和分支搭建，深入探讨了中国科幻电影、中国魔幻电影、影游融合类电影的想象力消费问题，角度涉及叙事(情节、人物等)、视觉呈现(空间、人物造型、影调等)、价值观念，以及技术美学、导演思维等，还深入到影像与现实的关系，乃至对艺术的目的与本质的思考。而在研究方法及意义方面，学者们不仅立足作品案例本身，融通艺术学与经济学，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论创新，赋能艺术生产与产业发展，更在电影史与电影理论溯源方面进行了追溯，为该理论的建构寻求学术史依据。

在厘清“想象力消费”理论的缘起与发展历程、本体建构和跨学科建构后，第四辑适时精选了六篇争鸣文章，多角度多层次为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的创新点在于对该理论的四个“内生变量”做了深入分析，考察了电影风格、电影科技、电影与观众、电影与文化发展态势四个维度；《想象力消费视野下的科幻电影》运用“想象力消费”理论，从社会层面、产品层面和运营层面考察了当下我国科幻电影的定位和走向；《“飞离在

场”：当下中国电影的想象力消费》从“想象”一词切入，对想象了什么、为什么想象、如何想象展开了深入思考，提出当下中国电影需要通过蒙太奇产生创造性的想象力；《电影想象力消费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考察》则针对“想象力+消费”组合概念，研究了“想象力”作为文化资本的形态、功能等，并将电影想象力上升至国家文化资本的宏观层面；《想象力消费：电影工业美学的延伸》提出中国当下影视的“想象力转型”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电影工业美学视阈下对“想象力消费”理论的前提、内容、面向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思考；《数字时代电影想象的转型与想象力消费》聚焦于数字时代的电影想象力问题，对电影媒介想象力的独特性、电影本体之变的影响，以及介入创作的人工智能与电影创作者的关系，均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凡此种种，对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的扩容、建构，与当下电影生产实践，都起到了正向催化作用，同时体现出当下电影学界学者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理念。

陈旭光对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的愿景之一，便是期望该理论能够通过跨学科的方法论创新，以方法带动观念和范式，撬动某种理论批评结构并促进其范式“革命”，促使中国本土性理论话语和体系建构紧跟新时代，结合具体实践，避免“隔靴搔痒”，消解脱离经验的“结构性阐释危机”。该书第五辑运用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对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各阶段“想象力消费”电影案例展开了深刻的分析与探讨，涉及面包括但不限于“想象力电影”的假定性结构、寓言性、制作的工业流程、世界观建构、“想象力”的层级等，由此总结提炼对中国电影的启示，凸显了该理论的现实针对性与务实性。

20世纪初，鲁迅先生对民族文化未来做出了殷殷展望：“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从某种角度看，“想象力消费”理论贯通中国传统，且具有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怀有切身体认，对国内外新兴学术思潮也保持着敏锐观察，正是对这种文化理想的呼应。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国学派”和“中国电影学派”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有效促进主流文化与青年文化的融合与互补，有效阐释新作品和新现象，最终推动中国电影强国建设。

《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争鸣集》一书的编纂与问世，呈现了该理论丰硕、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彰显出新媒介时代电影研究的新格局。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迎接该理论的迭代与拓展，以理论批评也是一种独特的生产力的方式，推动、见证中国电影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主观的“诗意”，“艺术纪录片”这一概念的提出和文本划类，可谓《诗学想象》最为重要和精彩的创获。

众所周知，求真、尚善(或曰认知、教喻)是纪录片功能的显著特征或曰主要的功能，尼科尔斯称之为“严肃话语”(Discourses of Sobriety)，视为所有纪录片都必备的根本特质。但是，却也确有“严肃”性淡化而审美性突出的纪录片，尼科尔斯所说的“诗意纪录片”即属此类。侯洪教授提出的“艺术纪录片”的概念，其“狭义”者正与“诗意纪录片”基本重合，它们是纪录片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其“广义”者则指向了整个纪录片总类必有的话语、功能的特质，侯洪教授精细地论证了对于诗学价值、审美功能的追求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每一部纪录片作品之中。在此，《诗学想象》对艺术纪录片的探析与界定为纪录片研究拓宽了视野。

主流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这一对范畴也是纪录片的两个端点，但相互对立的这两个类型却也有其共性：受着时代语境、作者语境的显性制约，因此，其文本的主体性和主观性是从不缺席也不容缺席的。媒介考古学方法主张恢复媒介物质性，并不是只将其视为一种技术，而应同时观照其运作机制和技术控制如何影响和参与形塑心智感知、社会化等方面。《诗学想象》在描述国家主流纪录片、民间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之际，重视的是其历程与诸般语境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语境分析时，不流于浮泛的泛泛而论，比如，在对民间独立纪录片生成机制和文本功能的分析、概括时，不是俗套地只重作者语境而强调其个性化美学特征，而加入了商业市场(包含平台)和国际电影节等商业语境、文化语境乃至艺术体制等方面的考量，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因而特别深刻、独到而切实。

《诗学想象》在讨论纪录片的表达对象与表达媒介之间的关系时也极具突破性，中编的四个章节对纪录片内容的生成给出了新的探索路径，不再是老生常谈的反映论或模仿论，而将饱蕴主观性、主体性的“记忆”与客观的客体之间的“相生相克”视为纪录片的生成机制，选取了人类历史重大进程或事件与纪录片创作重要发展阶段或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案例，深入探究了纪录片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

“城市与记忆”选取的首例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居主导地位纪录片的纪录片，此际也正是纪录片创作从“远方”转向“近处”的时期，工业革命和城市变化是纪录片重点关注的对象，“城市交响曲”式纪录片全球风行。这些纪录片不只是反映或表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节点与进程，同时也因其强劲的表现与思考而折射了媒介与所处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这样的专题研究也正是当前影视研究的前沿和重点难点课题，为立体化研究艺术纪录片做出卓越的理论贡献——不仅能够以媒介哲学思维考察和观照诸多纪录片类型与社会文化及其关联，还能严谨、合理地构建立体的、成体系的研究范式。

有着惊人规模的《诗学想象》不仅检视过去、审视现实，而且热情地迎接未来。侯洪教授在该书的下编对“后格列尔逊时代”的纪录片创作现状和新技术带来的大变局进行了理论透视和文本解析。他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正视中西“新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对挑战传统纪录片话语的动画纪录片、实验性纪录片、科幻纪录片等类型的合法性、发展潜力及其诗学价值、范式开拓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性论证，而这样的理论阐扬也为纪录片的诗学追求增广了广阔的新方向。高科技新技术来势汹汹，虚拟纪录片、参与交互式纪录片、数字无限性纪录片的诞生，Sora的话语重构功能、AI的无限潜能，以空前之巨力冲击着纪录片的“纪实性”，使得纪录片的未来成了目前最为关注的议题。新技术变革下纪录片将去向何方？在大家还在为新技术而惊叹时，侯洪教授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调研和严肃的思考，尽管这一切尚未尘埃落定，未来难以精确预料，《诗学想象》也没开出万应药方或实操指南，但其提供的研究框架和典例分析，已具有为业界、学界提供路径和引导的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人文影像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